



## 下川遗址新发现对北方细石器体系研究的意义 ——《北方细石器技术体系与下川遗址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综述

杜水生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7) 04-0121-03

2017年12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办了《北方细石器技术体系暨下川遗址新发现·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年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0多个科研单位的7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先生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夏正楷先生莅临会场并做精彩点评。

会议的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杜水生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郭家宏教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晓毅副所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吕厚远教授分别代表三个主办单位致欢迎词,并分别就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下川遗址的研究与保护、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趋势做了重要论述。

会议议程包括特邀代表发言、下川遗址考古新发现、北方细石器技术体系与环境变化、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委员会发展规划研讨四个主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和付巧妹研究员分别作了《现代人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和《古DNA获悉人类演化图谱》两个特邀报告。高星研究员从遗传学、化石人类学、考古学等角度对现代人起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国地区的新进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强调中国乃至东亚是现代人类起源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地区,而多学科整合研究应是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所在。付巧妹研究员着重介绍了田园洞人的分类地位及其在现代人类起源上的意义,认为田园洞人虽然属于东亚早期现代人的一个支系,但和现生东亚人的关系没有直接关系,而在现生的美洲亚马逊人中保留了较多的遗传因素。这表明在现代人类起源以后,不同族群之间迁徙交流过程仍十分复杂。

大会的中心议题“中国北方细石器技术体系”的讨论主要围绕下川遗址最新的研究工作展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杜水生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下川遗址2014-2017年期间的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指出在传统的认识中下川遗址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细石器遗存,其出土的石磨盘也与农业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的发现大大拓展了下川遗址的文化内涵,目前下川遗址中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分布在富益河圪梁的二级阶地上,文化内涵属于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石器,原料主要取自富益河里的石英砂岩等,但也有少量的燧石。下川遗址旧石器晚

[收稿日期] 2017-11-28

[作者简介] 杜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

期文化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初段为4.3-3.9万年,在这一时期,旧石器文化主要以黑色燧石为原料,石器的制作技术仍为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遗址的分布范围有限;早段为3.9-2.9万年,是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最为繁盛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火塘、石磨盘和赤铁矿,预示着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可能是一处以生产赤铁矿粉为主要目的的考古遗存。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用石英砂岩打制大型工具石斧、石锛以及用燧石制作的台形器,和同一时期日本的旧石器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从2.9-2.6万年开始,下川遗址突然出现了以船型石核、锥型石核、半锥型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技术和石叶技术共同出现,意味着石叶和细石叶技术可能同时出现在下川遗址。由于遗址保存情况普遍不好,下川遗址旧石器晚期晚段遗仅在流水腰地点保存较好,其出土的小型双面器代表了细石器文化在距今1万多年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所作的《郑州地区的细石器遗存及其相关问题》报告,详细介绍了郑州地区西施遗址、东施遗址和李家沟遗址细石器文化的研究进展,认为郑州地区细石器技术与石叶技术大致同时出现的时代也为距今2.6年前后;晚期的细石器则伴随着磨制石器与制陶技术共同经历了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的过渡;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十分重要,同时反映了外来人群或技术传播的影响,为本区史前人类与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细石器技术在郑州地区的发展历程应与MIS2阶段的气候与环境变化相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关莹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泥河湾盆地早期细石叶工业》,介绍了位于蔚县盆地的西沙河遗址,年代可以追溯到2.7万年,早期细石器技术的特征为楔形石核比例低、细石核外形多变且预制过程简单粗糙,细石叶能够勉强保持长宽比例但两边形态不易保持、细石叶平均宽度大于成熟的楔形石核遗址产品,端刮器较短小。

龙王辿遗址是位于晋陕大峡谷的壶口瀑布附近的一处重要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小庆研究员的报告《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的发掘与认识》,对该遗址的第1地点进行了仔细发掘和整理研究,其细石器层位第5层到第4层的年代为2.6-2.1万年,原料选自黄河阶地上的砾石层,可能由于原料缺乏,出土的细石核形体均较小,绝大多数台面经过预制修理。结合形状与技术两方面因素,龙王辿遗址的细石核主要可以分为锥形、半锥形、楔形、柱形、船底形等不同的类型;细石器类型包括细石器的类型主要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和雕刻器及石钻、石锯等。通过各类细石器微痕的初步观察可以看出,其使用功能复杂多样,既有维持日常生计的肉类的切割、动物的解体,也有资源开发的皮革加工、骨角质、木质工具的加工等等。虽然在龙王辿遗址骨角质、木质工具并没有发现,但细石器表面遗留下来的使用痕迹表明,当时这类工具一定是存在的。同时,在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发现的精美的蚌饰品也证明了当时人类生产技术体系的高度发达与复杂多样。

另外,黑龙江省考古所的李有骞博士认为,黑龙江地区早期细石器遗存也可追溯到2.6万年前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研究员的报告《下川遗址研究的历史回顾》,对下川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过程进行了总结,对下川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的定名进行了辨析,并呼吁下川遗址应纳入国保单位;任海云博士的报告《山西陵川发现的尖状器》,对山西陵川发现的尖状器进行了深入仔细的分类并与塔水河、下川的同类器进行比较研究,指出陵川尖状器类型包括尖状器、锥钻形器、三棱小尖状器、塔水河尖状器,这些尖状器既具有旧石器晚期的共同特征但也存在一些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邹秀佳对2009年以来对下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上的淀粉粒和植硅石研究的进行了介绍。

学者们除了对早期细石器关注外,也对不同地区细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区域性特点作了较深入的探讨。除了前述下川和郑州地区的材料外,其他研究还有:

黑龙江考古研究所李有骞博士的报告《嫩江中下游地区细石叶技术的编年研究》,通过对嫩江流域多个细石器地点的研究复原了距今2万年、1.3万年、1.1万年三个阶段细石核选坯、预制、剥片和废弃四个阶段的形态变化,尝试建立该地区细石器技术的发展历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岳建平的报告《中国东北小兴安岭南部细石器

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研究了小兴安岭南部的桃山和桦阳两个遗址在末次冰盛期以后细石器特征,石器制作者主要选取遗址附近露头或附近河滩里的凝灰岩和流纹岩为主要原料,以两面预制的楔形石核细石器技术和棱柱状石核的石叶技术为特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田川的报告《吉林抚松枫林遗址细石核研究》,研究了距今2万年前吉林省抚松县漫江镇枫林遗址的细石核,该遗址选择大块的黑曜岩为原料,以楔形石核为主要类型,这同华北南部尤其是下川遗址以船型石核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有明显不同。

河北师范大学赵海龙博士报告的题目是《泥河湾下庄旧石器遗址发现及认识》,介绍了泥河湾下庄旧石器遗址最新的发现情况,从地层学上证明泥河湾盆地以矮体船形石核为主的文化组合早于高体楔形石核组合,与我国东北地区相反。这对研究华北东西、华北与东北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胜前教授的报告《细石叶工艺起源的理论问题》,从细石叶工艺的研究缘起、定义的理论基础、起源研究、石器技术的变化机制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细石叶工艺是一种有利于狩猎采集者高度流动的石器技术,是两面器技术传统和棱柱状石核技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狩猎采集者对于末次冰盛期前后资源变化的适应,也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发展的顶峰,它产生于末次冰盛期前后华北腹地。并指出作为概念体系与研究实践背景的范式,文化历史考古(技术类型学)、过程考古和后过程考古三者并存与递进的关系,提出时代范式问题应该要关注概念、立论的前提、学术的社会背景,以及理论的意义对当前研究的启示等。

在环境变化的研究中,来自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邓辉教授的报告《〈水经注〉与京津冀平原水系变迁》,首先对《水经注》的成书过程进行了介绍,之后结合文献指出6世纪以来永定河不断向南摆的变迁过程,并说明由于京津冀平原是泛滥区,所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多生活在其周边山区或高地,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走向平原。同时介绍了白洋淀的形成与演化与宋代的军事防卫有关,而非纯自然的原因,而明代以后人为的作用愈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教授的报告《海岱地区史前生计与农业》,重点介绍了后李文化中月庄和西河遗址,采用植硅体、淀粉粒、微痕研究、土壤微结构等多种技术手段,从动植物考古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后李文化房屋建筑简易;陶器生产量和石磨棒盘使用逐渐增加;以觅食为主,食物生产为辅,所以是狩猎采集捕捞人群为主,植物栽培可能是实验性的,这个阶段是食物生产的尝试,年代为距今8200-7800年。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吴文祥研究员的报告《氧同位素3阶段以来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让我们了解到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以来中国气候变化对不同阶段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王心源研究员的报告《对遥感考古与空间考古的思考》,首先介绍了遥感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遥感考古仅仅发现是不够的,需要升华来回答考古需要解决的更多问题。认为空间考古不仅是空间技术数据的获取,更是空间分析的方法与范式,并且从框架认知、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性质、研究方法和内容等方面对空间考古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最后提出应该根据中国区域特点,开展特色的空间考古研究,选择3条线4个典型区域重点展开研究,并且针对专业委员会和开展综合技术方法支持下的综合考古技术、方法、理论以及范式研究提出建议。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夏正楷教授、陈发虎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小明研究员、青海师范大学的侯光良研究员对全天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对学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陈发虎院士指出,本次会议学者的报告对细石器文化的发展做了仔细的研究,但对文化变化的原因分析较少;夏正楷教授认为环境考古学者应主动和考古学相结合,只有深入到考古学中,才能真正解决考古学文化变化和环境的的关系问题。而学者们普遍认为既然学科之间的交叉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今后学会应该顺应这个潮流,加强相关学会之间的联系和联合应是今后学会工作的主要方面。侯光良教授提议类似的会议今后尽可能在西部举办,以促进西部学术的发展。李小明教授也特别强调了今后应加强文化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 汪高鑫)